

通识教育与公民素养的关系再辩

董云川^a, 张琪仁^b

(云南大学 a. 高等教育研究院; b. 学生处,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通识教育与公民素养的关系不是一个新命题。文章旨在从时间流变、空间扩展以及个体社会化这三个向度上,重新揭示其间的关系。通识教育是纵向的时代发展,横向的世界交往,以及学生个体融入社会群体必经之桥梁。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国度的表述不尽相同,教育的目标、内涵、外延、职能、责任也会随时代发展而更迭汰变。但通识教育所发挥的中枢职能功用从来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如若疏漏或者偏颇,既会导致教育的失职,也会造成健康公民社会的缺憾。

关键词:通识教育;公民素养;大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2)06-0093-04

一、从“谦谦君子”到现代公民

当今人们大凡论及通识教育,往往意指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局部,一般只作为主体专业教育的基础或补充。这是社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分流程程度提升对院校教育作出的要求,同时也是院校教育对社会变迁所作出的回应。通识教育追根溯源要从博雅教育谈起,虽然其教育对象、教育范围在当时有着明显的阶层划分,但在教育内容上,基本上囊括了教育的整体或全部。最早的教育大都是博雅教育,而非博雅教育与其他专门教育类型的组合,其与现今倡导的通识教育在指向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变化,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归因分析,但其中有一个因素绕不开,那就是“人才”的向度。传统的教育,无论是西方的博雅教育,还是中国古代的儒士之学,都指向并服务于符合当时社会标准的“人才”之培养。西方莫不过是“彬彬绅士”,东方莫不过是“谦谦君子”。原初的教育多以培养道德、情操、智慧为目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专业分工的细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业素养开始成为“人才”评价的核心评判指标,这似乎理所当然。首先,专业素养最为市场所急需。其次,相较于道德、情操等隐性指标,其效应外显,更方便检验检测。最后,大学各院、系、所各自拥有符合自身逻辑的专业培养模式。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院校教育所培养的“大学生”反而变得“小

气”了,缺少了大气魄、大情感、大胸怀,教育中的理、礼、义日渐消弭,博雅教育似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教育的目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总是会与“使人成其为人”的本质目标发生碰撞,时而吻合,时而偏离,而教育自身的调节功能也始终会在一定的区间和范围内调适前行。因此,传统的博雅教育并没有消弭无踪,而只是将部分空间让位于专业教育,现如今即以“通识教育”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培养合格人才的进程中,继续存有人之为人的情、理、义。

“公民素养”是一个具有时空意义的词汇。我们通常所提到的“公民”,往往意指现代公民,而谈及“公民素养”却不得不沿着历史的脚步回溯一二。朴素的公民观早在遥远的历史长河中就生辉溢彩,“公民素养”更是在历史的回溯过程中显出有本有源、多面立体的形态。以古希腊为例,由于其历经殖民、迁移、征战,追求独立与民主自由的过程,锻造出勇猛好斗、富于冒险和挑战的精神,据此奠定了古希腊民族的性格特征,从而在古希腊城邦里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公民与城邦相互依存,城邦是公民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公民的简单的数学集合,而是通过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将公民聚合起来。对古希腊人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好公民的标准就是具有开拓进取、冒险挑战、勇猛好斗、追求自由的精神。而相较于古希腊的战争历史,雅典城邦

收稿日期:2012-08-10

作者简介:董云川(1963—),男,云南云龙人,云南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所长,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云南省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张琪仁(1987—),女,云南宣威人,云南大学学生处科员,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

经济的稳定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公民的理性发展创造了更为宽松的环境,被认为是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城邦之一^[1]。雅典的繁荣不仅促进了整个希腊社会的繁荣,其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使雅典人产生了全新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在参与民主政治的活动中,在公民教育的培养方式影响下,古代雅典公民形成了理性、雅礼的品质和素养。雅典公民不仅具有天生的公民权和个人主义意识,还极为重视自身的修为,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追求美、智慧、自由等价值取向。在古代东方,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主流,君子以“仁”为本、以“礼”为质,仁义毕备,具有治国理政的能力与激情,有自强不息、独立自适的精神人格,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易经》的“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中庸》的学问之道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衡》中“博览古今为通人”,“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等等。管中窥豹,异曲同工,古代思想家无不认为博学多识才能达到融会贯通。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人们对平等、自由、道德、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要求与规范也发生着变化。在历史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文化的交织中,传统根基与现代思想不断融合、筛选,公民素养的内涵与外延也同步发生着巨变。每一个时代的教育目标都与那个时代中“需要何种品质的人”密切相关,当下“公民素养”的变革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需要培养出既能因应现代社会变革,又能站在宏观的历史角度思考;既能实现个体价值,又能创造社会价值的现代公民。通识教育便是回应这个时代要求的教育产物。其实,这一教育产物之形式与目的与传统相比并无创新,在东西方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古已有之。但即便如此,其教育内涵和内容却随着“公民素养”的时空变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当代的通识教育力使教育对象晓人文、知古今,成为博学多才、具备多种技能的人,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国家增添荣誉,背负责任感、使命感,理性思考、自由发展。作为教育对时代发展的一种回应,通识教育在形塑现代公民上着力,补充了专业教育、技能培养未照顾到的方面,在全球化、信息化飞速发展之际,“人”被外物肢解、愈被“物化”的过程中,正在努力作为以使“人”回归为真正的人。

二、从自然村落到地球村

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其交往的范围、活动的领域随着社会交流范围的扩大而延展;教育作

为一种生活方式,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现代社会带来的人口迁移、媒介互通、贸易生产全球化,使得教育的跨国界、跨区域交流成为了可能,并具有了现实基础。从教育对现实的回应来看,当今高等教育之国际化交流已然成为了新兴甚至是主流的职能。这一职能的实现往往在狭义的层面上,被人们理解为院校交往、项目共建、合作科研、学生交换、课程互认等等。无疑,这些都是高等教育交流的有力方式,但交流的本质意义还不仅限于在形式上的花样变换,交流其实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在农业社会中,一个人可以终身不离开生养自己的那方土地,一辈子不离开方圆几十里的“村子”。他/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晓“外面”的生活,“外面”的人也不知道他/她的存在。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劳动力大迁移,打破了这一平静的局面,成千上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流入生产线,他们的生活世界开始流动起来。在人们还未来得及完全适应一种全新生活画面的时候,信息时代的到来使“足不出户观天下”成为现实。视野被打开、人心被打开,自然村落信息的爆炸中“被打破”或主动突围,世界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任何人、任何地方都不再孤立于其他,而是连接其中。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别显映在生活方式上,最显著的莫过于生养环境的变化。一个农业文明中生存的个体,五十里地或许就是他/她的世界,而工业文明中的个体,或许有五百、五千公里的跨度,而到了信息时代,万里空间无非弹指一挥间。

信息爆炸和人口流动加剧了现代社会中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交流,甚至碰撞,也对人的应对能力与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院校教育作为一种予人自我救赎能力的方式或手段,也不得不随着这一深刻而微妙的社会变化而调整其方式、方法与内涵。随着公共媒体对人的生活及其方式的影响日渐深入,现在很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早已把媒体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通过媒体教育提高公民对媒体信息的认知,使其能够批判性地解读媒体信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的往来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流将更为密切,公民在工作中将会面临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不同国籍的工作伙伴,这就需要公民掌握多种技能与知识,以雅容之心面对不同的人、事、物。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必须顺应时势,给予学生以不同文化之介绍,不同知识之传授,最重要的在于,让学生在学的过程中培养再学习的能力,应对信息爆炸、知识

变更的外部社会,使其具有独立学习与自我发展的能力。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广泛的人口流动带来的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迁移,还有心理上的,更有文化上的、情感上的冲击,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归属感、农民工子女教育、城市文明建构等一系列的问题无不在经受着拷问和检验。对于教育来说,这绝不仅仅是提高某一类型人员之某一方适应力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社会公民的接纳能力和社会共情能力。这些问题如果交由社会发展自身来解决,把责任交予时间来延迟处理,社会发展必然会因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教育责无旁贷,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与社会和谐、与他人和谐、与自我和谐是现代公民培养,除了靠经济、政治等社会法制硬性指标的约束之外,还必须经由教育锻造人们的雅容之心、同理之心、友善之心、仁爱之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的当下,人的和谐发展成为了社会发展之后更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物化”、“分裂”、“对立”、“冲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成为常态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出发的地方静心反省,想一想、望一望,原初有动机、有动力,但哪里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在努力实现全面发展的征途中,人们往往早已被“浮云遮望眼”。而通识教育应运而生,便是一剂良药,藉由最本源的教育理想,夯实持续发展的“地基”,予以和谐发展的情理,在冲突的社会中,给予受教育者博雅之心、博雅之情、博雅之礼,在知识信息、生存背景变幻莫测、快速更迭的时代中,立人之本。而此时,通识教育之内涵与外延从最初的博雅教育到当今回应社会变化的更迭汰变,已经有所不同,其在坚守“使人成为人”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在社会发展与纷扰中的变化,以使人在内外交困、左右冲撞的当下,自觉于自我发展,实现自我救赎。

三、大学生与社会人

当下,很少有哪个大学敢言说自己要始终坚守“象牙塔”的理想。无论情愿与否,现代大学已经义无反顾地走近并融入了社会。何为大学?本是一个教育哲学的命题。高等教育的功能从发源之初发展至今,已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初,大学作为一个共同探究的场所而存在,一些具有强烈兴趣或已经专长于某种工作的人聚会发端,学校为学习者提供交流场所和生存环境,所以,传统的人才教育与当今的人才培养意蕴并不完全相同。现在的人才培养更侧重于为职业需要或将来生活做学业和技能的准

备。作为社会的子系统,现代大学所培养的人也在经受相应教育之后步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大学在此过程中承担的个体社会化责任自不待言。责任感、使命感、美感、同理心等,在毕业生步入社会之后,有时候甚至比专业知识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而当今大学的专业教育显然不能孤立完成这个综合的责任。所以,在高等教育情境之中,通识教育就需要担当起培养能够因应时代变化、具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现代公民的责任。

自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教授的帕卡德第一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通识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由马修·阿诺德多方倡导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引起越来越多大学对通识教育的重视。耶鲁大学最早开办自由教育,哈佛大学倡导学生文理交叉,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文库”等都试图把“全人类的文明经典”介绍给学生^[3]。通识教育通过陶冶学生的内在情操、发掘潜质,孕育精神气质,培养更加全面发展的人。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终究是要成为一个融入社会群体的人。一旦步入社会,谁都无法避免严酷的竞争与挑战,无法回避与不同的性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不得不努力了解不同的文化与知识,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共处素质,具备与人和睦相处的能力。而对于瞬息万变的工作内容与工作要求,学生更需要关注追求终生学习的能力。凡此种种,无不需要通过通识教育来增强、实现,特别是通识教育所连带出来的非正式教育活动,社团组织交往、社会实践锻炼等,各有功用甚至是“无用之大用”。当代大学在时代的变化中彷徨、探索、顺应、坚持,大学教育也在其中经历着斗争、妥协、突破,大学生作为培养对象在脱去了“某行业拉动经济发展所需专门人才”的功利外衣之后,最终还是要还原到“完整的人”的本真。生命是生存的前提,生活使生存变得丰富多彩,所以,生存不是终极状态,大学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具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还是要努力造就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尊重并培养有兴趣、有激情,并能够美化生活的“全人”。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愈加精细的同时,由专业教育日渐挤占其位并从教育中逐渐剥离出来的“个体的社会化”熏育责任,不得不转由其他的教育方式来完成,通识教育自然成为承担这一职责最合适的主体及方式。

四、结论

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对时代发展的一种回

应,补充了专业分工、分科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上的“照顾不周”。通识教育从博雅之源发展至今,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剧变。为了承担从“谦谦君子”、“彬彬绅士”到现代公民的现实培养职责,教育内容早已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同时,“人”越来越被外物肢解、愈被“物化”了,而要将人回归到人的位置,通识教育责无旁贷。在“冲突”、“分裂”的当下,通识教育能够给予学生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精神源泉。从现实层面来讲,大学生作为“准社会人”,需要在经受大学教育的阶段便得到个体社会化的过渡性实践,通识教育则是跳

出培养“某行业发展所需专门人才”之屏障的突围教育,在形塑学生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美感、同理心等方面,可以大大弥补专业教育的偏狭与不足。概言之,“通识教育”无非是一个名词而已,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领域、不同国家教育中会被赋予不同的概念,或是博雅教育,或是人文素质教育,或是经典教育,称谓并不重要。通识教育在任何一个时代的称谓、目标、内涵、外延、职能、责任无不是对当时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回应,与未来、过去都不完全一致,正是由于这样的不一致,通识教育才愈具魅力、愈有价值、愈能够因应现实并充满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赵映诚. 古希腊公民社会与公民精神[J]. 理论月刊,2005(5).
- [2]代训锋. 君子之道:走向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3]徐海林,彭泽民. 浅析学生公民素养教育目标确立在学生公民素养教育中的作用[J]. 安徽文学,2010(23).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Education and Citizen Accomplishment

DONG Yun-chuan^a, ZHANG Qi-ren^b

(a.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b. Stud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education and citizen accomplishment is not a new topic. The paper aims to re-investigate this relationship from aspects of time stream, space expansion and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It is concluded in the paper that general education embodies the advance of times, the communications of the world.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students to integrate with the social communities. It may be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times, cultures, and nations, and the goal, content, form,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education may vary with the advance of time, but its essential functions can not be replaced. Malfunc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may lead to the failure of education and absence of a healthy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general education; citizen accomplishment; university education

(责任编辑 朱春花)